

1912

台山文史

第二十三辑



台山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

台山文史

第二十三辑

台山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

1998年11月

责任编辑：陈日生

台山文史

第二十三辑

编辑者：《台山文史》编辑部
（广东省台山市台城镇双亭街15号）
出版者：台山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
印刷者：台山市人民印刷厂
出版日期：一九九八年十一月
出版证号：广东省非营利性出版物
粤印准字第1440号
工本费：13元

EA75/21
台山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

主 任：邱真全

副主任：伍其荣 梅逸民 马作林 林雪芳

委 员：李才金 梁伟权 朱友源 邝自信
关泽锋 许元惠 刘 欣

目 录

回忆录

- 陈三嫂自述..... 陈 田 撰文 伍 珍 整理(B1)
- 艺史留辉——回忆台山县文艺宣传队一队 陈连喜(51)
- 台山县农村文艺宣传队二队回忆录 马作林(78)
- 附:照片二幅..... (95)

台山人物

- 全国劳动模范李球柏传略 陈连喜(97)
- 女书画家曾伟志传略 梅逸民(113)
- 常德会战后之余程万 陈日生(129)
- 骆家辉及其中国之行 陈心桥 整理(134)

经 济

- 新时期党的个体私营经济政策在台山的实践
..... 马岭南(149)

陈三嫂自述

陈田撰文 伍珍整理

一、革命生涯简述

我叫陈田,乳名保重,化名三嫂,今年76岁。我年青时多与进步人士交往,深受时代精神影响,追求真理,向往共产主义,终于通过组织关系,于1949年5月离开广州返回家乡台山,参加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游击战争。当年,我28岁,在广州有一个温馨的家庭,丈夫黄覲贤在中山医学院读书,我在一所小学任教,膝下有个孩子叫鹤鸣,又得到有侨汇收入的家姑在经济上的接济,家庭生活过得较好。

当我按照自己所选择好了的道路,要坚定地到游击区去时,必须先把孩子安顿好。此时,解放战争战火南移,大批国民党的军、政界人士,在广州落脚。由于广州是敌我双方军事争夺的中心,所以家姑便到广州来把孩子接返乡下。记得,当我买了船票,送家姑和孩子上船时,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这不是普通的别离!

送走孩子之后不久,我就离开了广州,辗转10余天,在交通员的领引下,于6月1日进入“台开赤游击区”,在“粤中纵队滨海总队”的台北独立大队(北海队)当上了卫生员。

不久,发生了联安战役,自6月24日起,滨海游击队与国

民党保安部队在赤水、联安地区激战七天。滨海总队有不少伤员,加上有多名不能随军行动的重病号必须安顿好,以便治疗。于是,成立了临时医疗站。我被抽调到医疗站工作,历时数月,直至这批伤病员治愈归队。医疗站结束后,我转到总队部直属的七一连当卫生员。

台山解放后,滨海总队改编为粤中军分区辖下的 21 团,总队长林兴华任团长,另成立了台山县大队,一位叫于斗的南下大军同志为大队长,李保罗为副大队长,我编在县大队当卫生员。

1950 年 1 月,县大队开至紫罗山区剿匪。战斗中,我在战地上抢救伤员,表现出色,立了三等战功。不久,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尔后,我接受了一系列正规的医学培训,获得了医助职称,并升为医生,先被安排在开平人民医院工作,后转回台山人民医院。1977 年 7 月离休。

二、童年与出生地

1921 年 1 月 26 日,我出生在开平县(市)米岗村一户华侨人家。曾祖父、祖父和父亲都是小时候被收养的,长大置了家,便又到外国谋生去了。经历三代才生了我这一个女,一家皆大欢喜,给我取名“保重”。其中祖母特别疼爱我。

我祖母姓司徒,名爱,18 岁嫁给爷爷,婚后仅一个月,爷爷就出国谋生,不幸客死他乡。祖母含辛茹苦把持了这个家,靠绩麻、织布、养鸡鸭、养狗、种瓜菜,积蓄了一些钱,收养了一个年仅 3 岁的男孩,改姓陈,取名翰芳。他便是我的父亲。祖母供他读了几年书,陈翰芳 18 岁与邓良秀结婚,婚后不久,即

到外国做工去了。

我父亲在美国做了几年工,积下了一笔钱,便返乡建造了一间房子。第二年,我出生后不到三个月,父亲又去出洋,1957 年在美国去世。

母亲生长在农家,姊妹很多。她从小牧牛,结婚时才 16 岁。她秉性纯良、勤劳俭朴,但对针线等家务一窍不通。祖母耐心地教她学会了针线,见她没有上过学,又鼓励她进入本村女校读了三年书,让她能写会算。祖母与母亲都乐意帮助别人,与邻里和睦,特别是在红白二事中,能为人精打细算,让事主尽量节约。所以,大家都把她俩视为贴心人。

童年时我的这个家,母亲担当起全部农活,经常在田间劳动;祖母负责顾管我,她教我学会了绣花,又教我学会了各种家务劳动和做人的一般道理,还教我唱民谣,给我讲故事。

我的出生地米岗村座落在潭江中游南岸,是一条侨村。男人们大多出国谋生去了,留下来的男人多是缺少文化的耕田人;妇女们多是有点文化的,思想较为开通。出洋的男人,主张开展文娱体育活动,所以,连妇女们都很喜欢排球。那时打的是“九人排”。我母亲长得个子高,专责拦网。每逢排球比赛,祖母就背驮着我去看球赛。此时,村里人群熙攘,非常热闹。

我童年时,家里缺劳力,农忙时要雇工帮忙,祖母便作出佳肴招待他们,我则帮着摆晒谷子,赶走跑来啄食谷子的鸡鸭。

米岗村靠近潭江边沿,常遭洪水浸屋。那时年纪小,不懂事,在家里玩水,坐在大木盆里,当船划。待至退潮,祖母、母亲便把门关上,潮水退尽后便见有好多鱼虾在屋里的地面上

又蹦又跳，全都被捉住作馐菜。但有几次江水几乎浸上门楣，人们爬上瓦面躲避，并在屋项上煮饭吃呢！

母亲是我童年时心目中的英雄偶像。有一次大雨过后，她见刚插下的秧苗被淹了，即锄开田基放水。同巷的缙浓公却不准她放水。并说：“你用水桶把你的田水挑到别处倒掉不就可以了吗！”母亲明白：上田管下基，是耕田人的规矩，天经地义。所以不再理睬他，照样放水。缙浓公气极了，便在巷口大声谩骂。祖母听了以为出了什么事，母亲泰然处之，平静地说：“他连自己也不尊重，还有资格做父兄吗？！”把事情经过一五一十地告知祖母。祖母叹了口气，说：“他太欺负人了，不理睬他就是了。”

缙浓公骂累了，见我家的人不理睬他，自讨没趣，以后也不再对我们发脾气了。

母亲说过，自己有道理，上祠堂也不怕。“上祠堂”就是村中的人有了纠纷，请父老们到祠堂去评理，并商议解决。

米岗村在乡的男人很少，妇女占绝大多数。因为只占少数的这些男人缺乏文化，所以，他们作出的决定，有不少是不合理的。妇女们对此忿忿不平。因此，每当她们得知“父兄”们要“上祠堂”了，必定前往旁听，如觉得作出的决定不合理，她们中总是有人站出来大胆发言。初时，曾有“父兄”大声呼喝：“如今成何体统了，你们妇女上祠堂了！”有一位叫缙裕三婆的便大声反讥：“我的缙裕不善于讲话，我是代他上祠堂来的！”其他妇女也跟着说，自己的丈夫在国外谋生，她们是代表自己的丈夫来上祠堂的。由于妇女们人数众多，有文化，善于辩论，“父兄”们无可奈何，只有容许她们上祠堂参与议事了。

米岗村的妇女们还敢于上公堂打官司。一次，我村一个

叫阿宝的姑娘，嫁给同乡东坑村一个姓邓的赌徒为妻。该赌徒弄得家境一贫如洗，还经常迫逼阿宝回娘家借钱给他挥霍，如没有钱带回给他，即遭打骂。有几次，甚至阴部也被他用剪刀刺伤了。丈夫没有人性，阿宝回娘家借不到钱，当然不敢回去了。其丈夫便诬告她私奔，带了赤坎警察所两名警察到米岗村来，要押解她回家。村中全体妇女趁机与之论理，在警察面前控诉他虐待妻子的恶行，让他无地自容地遁走了。阿宝在娘家的婶姆姊妹们支持下，有了勇气，向乡公所提出与赌徒离婚，并要求赔偿损失。米岗村推出两名父老、三名妇女为正式代表，到乡公所出席公堂，其他的妇女则前往旁听助威。

女代表中有一位是我的母亲。村人推举她为代表，因她善于辩论，平时好抱打不平；另外，她与该赌徒同姓，又是东坑村附近的龙口村人女，占有人和之利。

母亲以代表身份在公堂上发言说：“我姓邓，是龙口村人女，但我帮理不帮亲。古语云：做夫妻，吃得笑眉粥，吃不得皱眉饭。我们的宝姑娘嫁到男家，皱眉饭皱眉粥都没有得吃。”跟着便历数赌鬼虐待妻子的恶行。尔后，多位代表与证人也作了发言。结果，男方理亏同意离婚，在乡长和两位村长的主持下，立字为凭，并判男方赔偿女方之损失。

这群妇女浩浩荡荡地返回米岗村，象打胜仗似的，受到了村人热烈欢迎。

米岗村办有一间小学，我在本村读了四年初小。该小学因经费困难，停办了，我便转到外婆家所在的村子附近的树英小学读高小，食宿在外婆家。此时，外公邓业恒已离开人世。外婆家以耕田为活。在读小学期间，我学习用功，成绩不俗。

每逢星期日，我多是跟随母亲到潭江边的泥滩上拾河蜆

和捉鱼虾；暑期中正值收割、插秧大忙，我则帮母亲干农活，也跟她到外婆家挖“落地”花生。日子过得很愉快。所以，我的童年生活虽然清贫，但很充实，充满了乐趣。

三、小海启蒙及长师毕业

小海小学座落在开平县(市)赤坎镇龙护乡(小海村委会)。1996年10月31日是该校建校七十周年和新教学大楼落成十周年之喜庆日，我作为校友，回去参加了该次庆祝活动，并献上了贺仪1000元人民币。

把岁月倒推六十年，我16岁小学毕业时，听一位同学说，离我外婆家不远的小海小学开设了升中班，建议我到该校读升中班之后才去考中学。是年秋，我接受建议到小海上学了。斯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学校的抗日救亡活动，如火如荼。在小海一年，通过在校受到的教育，使我认识到，统治者腐败无能，劳苦的大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因之，我萌生了参加革命的思想。

小海小学是由护龙乡小海地区一群在广州读书的爱国爱乡青年出钱出力于1926年开办的。早在1924年，他们成立了“小海留省学会”，当年暑假，该会便派出邓朝均等回乡办起了两个夏令平民义学班，翌年暑假则办起了三个义学班。小海小学是在义学班的基础上办起来的，邓朝均是最主要的创办人。当时，他在岭南大学附中读高中；他为建立这所平民小学奔波劳碌。办学宣言、章程和详尽的办学计划，都是由他负责写出的，并担任《小海青年》编辑。

邓朝均在国内外求学时担任了多个学生团体的重要职

务,例如在美国求学时被推选为威斯康辛大学中国学生会的主席。1936年5月他在德国柏林大学攻读时因肺病去世,终年31岁。

小海小学以“晚景邓公祠”为校舍。该祠很大,祠后是操场。祠内除了校务处和课室之外又有礼堂和图书馆;教学用具和设备又多又好。该校的体育活动很有特色,它的体育队参加有关的比赛均能获奖,礼堂里有一处地方摆放着琳琅满目的奖品,小海人为此感到自豪。

当时小海学校,校长邓觉民和教师思想进步,很有学问,让学校实施了“德、智、体、群”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尤其重视妇女要争取解放的问题,提倡男女平等。

二、三十年代以及四十年代初的开平侨乡,大姑娘绝大多数都留着一条长辫子。小海小学的女同学,在学校的鼓动下,大都把辫子剪掉了。

在一次校会上,老师又动员剪辫。我不顾忌母亲和祖母的反对了,当场把辫子剪掉。她俩知道了,痛哭不已,声言不给我回家了。这结果我是预料到的,但我想不通的是:母亲和祖母待人接物,处理事情,向来是通情达理的,对我更是疼爱万分;为什么在我剪辫子的这个事情上,竟然长期反对,且反应是如此的强烈。我敢于把辫子剪掉,在她俩的心目中,我是大逆不道之人,要把我赶出家门了。为此,我横下一条心,以校为家,在学校食宿,不回家,也不到外婆家去了。校长、老师和同学们都同情我。父亲把钱寄到学校来支持了我。由于父亲十分赏识小海小学所提倡的新女性运动,我剪掉了辫子,他很高兴,除写信感谢校长和老师们的教育和照顾外,还写信批评母亲盲塞,这样,我与祖母和母亲的关系才得以缓解。

我读升中班时,还发生这样一件事:母亲见抗战爆发,总想早日把女儿嫁出去,以免成日牵挂。但遭到祖母、父亲和我的反对,她才不敢接受那些“好门口”的人之聘礼。

我就读于小海,接受了时代的新思想、新精神,的确是幸运的。

“七·七”事变的当年 10 月中旬,日机便多次对新宁铁路全线空袭,台山县境之斗山、白沙、台城、大江、公益等处受害甚重。开平县赤坎圩被炸得楼房倒塌、血肉横飞,惨不忍睹。米岗村有不少家庭因此而痛失了亲人。

当战火烧到眼前时,我母亲忧虑过度,病倒了,于 1938 年 3 月去世。此时,父亲也没有多少钱寄回来,而由祖母作主收养的比我大两岁的哥哥却好吃懒做,导致家庭经济状况明显地困难起来了。

我在升中班结业后,便在米岗村附近的岚头小学教了两年书。1940 年秋,我考上了省立长沙简易师范学校。翌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侨汇完全断绝,物价上升,家中缺粮。长简师因是省立的,就读的学生均获得每月大米 30 司码斤(略多于 36 斤)的公粮配给。为了在配给的粮食中节约出一半拿回家,我和几位境况相同的同学,在获得总务处和膳委会同意后,把每月 30 司码斤大米领了出来,自己在学校附近租个地方开膳,每天一粥一饭,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

当时,我家无以为生,只好靠变卖旧衣物度日的。在我村,国未亡,有些人家已先破了,如此国难家仇,何日洗雪啊!

1941 年伊始,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长沙简易师范学校的进步师生受到了威胁。长简师有的人布置了三青团的团员学生,监视、侦查进步的老师 and 同学,手段极

之卑劣,师生们极为愤怒,但为了安全起见,只好忍着气,设法避之。我那时接近何平仙、余雪霖、梁美润等同学,坚持阅读进步书刊,暗中组织了读书小组,利用假日或课后的时间,到乡下的山野间去学习。这样,我班那三个三青团员学生,即使要尽手段,还是捞不到我们一点可疑的情况。

但是在这次反共高潮前后,小海学校的遭遇令人悲愤。有不少教师因受到诬告与恐吓,被迫离校避难,有的牺牲;只剩下几位女教师留校坚持教学。学校被搜查后,稍为值钱的东西都被掠去,如银鼎、挂钟、铜钟等。

为了安慰留下来的几位教师,我多次回校探望她们。每次去了,见得校园冷冷清清、凋零不堪的样子,都禁不住伤心落泪。抗日有罪,令人悲愤!

为什么小海小学被摧残得那么厉害呢?原来,它自创办之日起,当地土豪劣绅便感到他们的特权和利益受到冲击,故此力图扼杀之。单是在女学生剪辮的问题上,他们就放出了许多风言风语,煽动一些不明事理的人和指使一班流氓、地痞到校捣乱。当时刚接任校长的邓锡林与全体教师决定武装护校^①,并得到校外年青人响应。有一位邓以笙的年青人,是小海留省学会会员,他把家里的枪支带去参加护校,声言以死拼之。这样,那班流氓、地痞不敢轻举妄动。

同时,国民党的开平县政府也不喜欢这所激进的学校,以该校没有教育基金来源为由,诸多责难,不给予注册立案,并扬言要封闭它。但邓锡林校长毫不气馁,与有关人商议后,假以每年投充三圭山的山草收入为教育基金上报,几经周折,终

① 1949年以前,四邑侨乡的侨眷家庭大多数置有枪支以自卫防盗。

于获得县教育局批准立案,小海小学才有了“合法”的地位。但是,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忌惮小海小学的土豪劣绅和开平县国民党当局的极右人物还是趁机摧残它。

长沙简易师范学校之学制为四年,前三年为常规的初级师范课程,第四年是军训兼选学一些高中课程。我入学时,该校设在台山县获海埠附近的六槐乡。翌年日寇两次入侵台、开,学校迁至赤坎圩以南约6公里的百合圩上课,直至抗战胜利才迁回三埠。

1944年,我在长简师毕业前,日、伪军第三次大举进犯台、开两县,三埠失陷,局势危急,学校奉命暂时停课,所有学生疏散离校。

由于日军占领三埠之后,即停止进犯,所以七、八两个月,赤坎、百合地区仍在国民党政府的控制之下,尚算平静。九月上旬,校址在百合圩之长简师通知我们回校考毕业试。我接到通知后,便立即回校了。

9月中旬,三埠之日、伪军主力,策应桂柳会战,继续西犯,开平县之赤坎、百合、蚬冈、君堂等圩镇受其兵锋所害,相继失陷。我们刚刚考完毕业试,即遭此劫,不少同学逃难到两阳去了。

潭江赤坎至百合河段,长约7公里,南北向。学校所在的百合圩,在其南端西岸之江边,我的家乡米岗村则在其北端东岸的江边,相距约10公里。是时,日军的舰船,不断从三埠载运部队,经赤坎、百合,运至蚬冈登陆西去。我不能过江回家,只能跟随同学逃难到阳江去,随着又逃入阳春,住在阳春八合村一位同学的家里。当地有几个地主得知我和另一位女同学是从台、开两县逃难来的,意欲求婚纳为妾侍。遭我们严肃对

之,使他们不敢托媒。经此,我即转往阳春城,经同学李容仙(新会人)介绍在阳春县立师范附小找到一教席。

我的丈夫黄觐贤是台山县(市)白沙西村人,小海校友。原来他在广州培英中学读书,“七·七”事变后,他多次回到小海母校,与我们一起搞抗日救亡工作,从而认识了我。尔后,他去了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南返时在西安被国民党反动派禁闭,幸得集中营的管理人员中有一广东老乡设法把他放走了。他返回家乡,得知我在阳春,即到米岗村向我祖母要了我的棉被、衣服等带去给我。寒假时,我返回乡下。1945年春,我与黄觐贤结婚了。婚后不久,两人便到鹤山教学。一个学期之后,抗日战争结束,我俩又返回台山。

1946年下半年,我与丈夫以及长沙简易师范的同学何仲儒、小海小学老师邓维亚一起在广州郊区的仑头小学任教。我在该校任教一年,但在广州呆了近三年之久,终于找到中共地下组织,参加了革命。

四、进入游击区 当了卫生员

我在广州时,曾在阳春师范附小任教的同事李雅娴,亦在广州。1949年初,她介绍我结识了朱彩英。朱是中共广州市委的地下工作人员。当她得知我迫切要求到革命的最前线去,到游击区去,以及获知我丈夫正在中大医学院读书,我平时也喜欢研究医理、药理等情况之后,十分高兴。有一次,她对我说,我党领导下的台山游击队,迫切需要医务人员,希望我在这个问题上有所考虑。尔后,我多次对丈夫作出试探,希望他能表态与我一起到游击区去,但他没有反

应，我心里生气，决定自己去。其实，黄觀贤此时已在何琼同志的领导下进行地下工作了。他为了保密，才对我的试探不作表示。

去游击区之前，我在家里积极学习如何进行急救等技术，如消毒、包扎、打针等，也研究对常见疾病的治疗方法。

1949年5月18日，我乘搭了“新联泰”花尾大渡船离开了广州。朱彩英指导我打扮成雍容华贵的少奶奶；朱则扮成佣人送我上船。同时，她买的船票是包房票，让我在船上独住一个房间，既符合“少奶奶”身份，又避免与船上的人接触。此外，我带了购买的两袋药品放在房间，药品上面摆满了名贵的水果以掩人耳目。

翌日中午，我返抵台城，按址在环城南25号二楼找到李雅娴，在她家住了几天，认识了台山一中进步学生周洁明。一天，台北区地下工作人员谢新民与林瑞忠到来，画了个地图，指点我去水西村与一位同志接头，并教我接头的暗号。当我记清楚后，他二人即把所画地图烧掉，并送我到台荻车站搭车。

下车后，我按图索骥地走过了水西圩。不觉间，到了有两棵榕树生成交叉的闸口。我踏进树闸口，即见对面一长条石凳上，躺着一个中年男子，估计是他与我接头的了。但他以白通帽盖着头睡着。我心急了，见没有人来，便拾了一泥块，掷在他身上，他转转身又睡着了；我又拾了一块小石头，扔中了他的白通帽，“卜咚”一声，惊醒了他，翻身坐起来，睡眼惺松地问我：“你的先生是做什么的？”我回答：“我的先生是教学的。”他连忙说了几句“对不起，对不起。”